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ER SHI SHI JI HOU QI ZHONG GUO WEN XUE SHI LUN

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史论

龙
潜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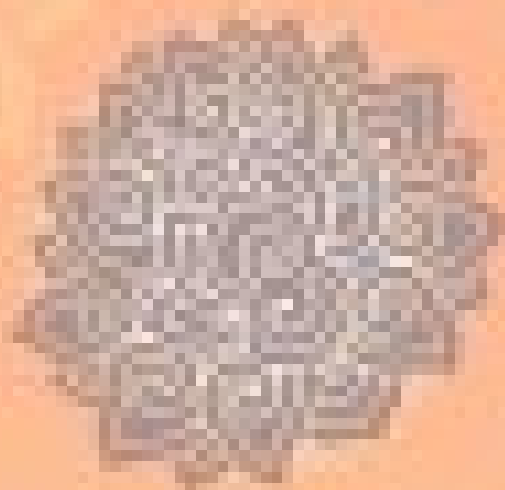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论

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史论

中国文学史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获 2006 年度贵州民族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史论

龙 潜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史论/龙潜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7

ISBN 978-7-221-07809-4

I. 2... II. 龙... III. 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787 号

责任编辑 程 立

封面设计 张 彪

名 书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史论

著 者 龙潜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排版印刷 贵阳恒鑫印务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38 印张 26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1-07809-4/I·1592 定价:27.00 元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吴大华

副主任委员：高万能 刘胜康(常务) 唐建荣

郁钟铭 杨昌儒

委 员：顾朴光 金明仲 徐晓光 石筑一 岑燕明 何 彪
王芳恒 杨正万 任达森 张艾清 白明政 吴晓萍
龙耀宏 范元祝 贺又宁 龙 潜 王建山 岑燕坤
沈昭华 洪震声 谢 兵 陈 凡 肖唐金 肖远平
郭 颂 倪绍勇 龚 锐

办公室主任：金明仲(兼)

办公室成员：潘朝霖 柳远超 柳 斌 童 健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的脚步与背影	/1
第一节 文学格局	/1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潮流	/10
第二章 全球化语境	/22
第一节 民族基础	/22
第二节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27
第三节 文学传统	/37
第三章 现代性与历史性	/46
第一节 中国文学矛盾的演变轨迹	/46
第二节 中国文学变革的思想背景	/58
第四章 文学批评	/73
第一节 中国的文学批评	/73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嬗变	/85
第三节 文学批评的走向	/96
第五章 文化批评	/106
第一节 文化批评的现状	/106
第二节 文化批评的寻觅	/111
第三节 文化批评的思考	/114
第六章 文学的寻找和表现	/123
第一节 文学的寻找	/123
第二节 文学的表现	/139
第七章 文学的潮流和守护	/144
第一节 文学的潮流	/144
第二节 文学的守护	/154

第八章 诗与诗学	/162
第一节 诗学的话语空间	/162
第二节 诗学的疼痛	/174
第三节 论争与反思	/178
第九章 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	/186
第一节 契合与分歧	/186
第二节 性爱意识的历史演进	/192
第三节 女性文学精神分析	/197
第十章 先锋文学与新生代文学	/210
第一节 先锋小说的文本挑战	/210
第二节 英勇的长旅	/215
第三节 遥远的历史	/231
第十一章 文学的困境与回归	/242
第一节 文学精神的困境	/242
第二节 文学现实的回归	/247
第十二章 文学的嬗变与状态	/261
第一节 对传统写作的挑战	/261
第二节 后审美范式	/268
第三节 机器的奴隶或主人	/280
第十三章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289
第一节 现象描述	/289
第二节 现实主义	/297
第三节 现代主义	/305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	/311
参考文献	/321

第一章 文学的脚步与背影

第一节 文学格局

—

西方文学的世界化得益于资本的扩张和启蒙思想的发展。18世纪以来,资本以血与火的洗礼撒向了五洲四海,作为资本克星之一的文学随之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个十分陌生的世界。19世纪的文学家、思想家们呼唤世界文学的出现,但是一直到20世纪,文学世界化的格局才真正形成。

文学的世界化与资本世界化、意识形态世界化同步,但是也与后二者相磨相荡,并逐渐形成化解乃至超越后二者的文学世界的格局。资本的世界化化出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意识形态的世界化化出了一堆片面而自负的理论。文学的世界化化出了一方灵气勃发的文化天地,它使资本所支配的文化领域获得了本真的气息,使意识形态的板块得到了春风化雨的滋润。如果从几个大的方面分析,西方文学世界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大转折。

第一,意识形态文学的式微。广义来讲,意识形态文学是指附属于一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文学。狭义而言,意识形态文学是指现代化过程中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性文学。这两种解说有一个共同点,即典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文学是近代工业文化一体化的产物,是政治经济单向整合的结果。意识形态

文学的最深沉的本质是依附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审美的麻醉性,最直接的效果是变相地传导着主流意识与权力话语。

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已经有了意识形态裹胁文学的问题,但是其政治经济和统治意识尚未达到千篇一律的机制化规范。文艺复兴至 17 世纪文学意识加快了形态化的步伐,然而相对宽松舒缓的生存空间为文学留下了一定的原生性的余地。18 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所驱动的现代化社会演变,真正地将文学卷进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机制,使其成为后者整合所有社会文化的互动性话语。文学意识形态真正地变成了意识形态文学。

意识形态文学给人们留下一个正面的形象是“批判现实”以及调节社会发展的功能,学术界津津乐道左拉的《萌芽》、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蜚声文坛的名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尤其推崇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不错,这些作品的积极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此类评价忽略或者说遮蔽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上述批判性的乃至革命性的作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文学的另一面,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刺激剂,是政治经济正反两极机制的互动,是迈向现代性社会的文化工业的制动器,是政治性文化所允许的反讽性话语。从实质上来讲,这些刺激和反讽始终在意识形态文学的互动、互补、互助、互化中运作,它们无论多么尖锐激烈,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两极依存的格局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意识形态文学的批判逐渐形成了气候。如果说 20 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本能地无意识地抗拒意识形态文学,那么该世纪中叶的荒诞派和超现实主义思潮已经明显地突破了意识形态文学的藩篱。而 20 世纪末叶,意识形态文学则在整个西方成了众矢之的。

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视意识形态文学为文学精神的堕落。西方的激进思想家也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看作是对人文精神的扭曲。晚

年卢卡契与阿多诺对文学政治化的批判异曲同工,索尔仁尼琴与巴赫金在政治高压且信息封闭的情况下竟然于抵抗意识形态文学上殊途同归,从东欧到西欧,从欧陆到美洲以及大洋州,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逐渐趋向一种共识,以意识形态为机制的文学模式亟待终止,文学必须从意识形态的网络中剥离出来。可以这样讲,20 世纪的文学是以意识形态化的式微构成了自己觉醒的标志。

第二,民族国家文学的淡化。民族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运行机制,也是文学的重要参考坐标之一。西方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近代以来整个西方文化的奥秘之一。文学的解放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从政权轴心、从民族利益和潜在的向心倾向中逸出。从文学突破狭隘利害机制的自觉不自觉的步履来说,这样的逸出实际上是文学的高级智慧和超越精神的创造性发挥。

文学摆脱国家主义的桎梏是西方文化绚丽的一笔。西方的现代国家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产生的国体和政体形式,具有一体化追求的本性。在所有社会门类当中最早意识到文化工业一体化危机的是文学艺术,最早奋起抗争的门类也是文学艺术。就在西方现代国家形式蓬勃发展的 18、19 世纪,以表现异化、反对社会畸形演变的文学作品和思想批评已经萌发。席勒的《美育书简》披露或述说着一种可怕的社会发展趋势。文学对政治的体认和反弹在 20 世纪蔚为大观。卡夫卡的《城堡》,罗伯尔·格里耶的《橡皮》,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折射出对文学政治化的批判,展示了国家主义文学的没落。

文学超越民族主义羁绊是西方文化自我批判的深沉反响。文学超越国家主义不易,超越民族主义更难。即便在资本横行世界和普遍主义遍及全球的 19 世纪,民族主义一直是共性大潮后面的实质性尺度。当时比较狭隘的欧陆作家自然受制于民族主义的支配,甚至伟大的文学家如海涅、歌德、雨果也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理念坚信不疑。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在 20

世纪中叶以来,清算民族劣根性、克服民族狭隘性成了西方的文学大潮。随着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唾弃,随着欧盟的扩大和苏联的解体,文学家、批评家和思想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妇女解放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潮、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和文化帝国主义消解等开放性的价值取向,谱写着雄浑有力的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学交响曲。

文学突破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成熟的标志。中心主义是西方思想文化的组织原则,因而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础。其吸纳性认同和规定性排除的向心制导体系,潜生暗长于语言、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许多方面。要想纠正西方思想文化的强权机制,必须突破中心主义对新生文化可能性的钳制。尼采亦文亦哲的著述开辟了批判西方传统的先河。海德格尔诗化哲学的创制将尼采对西方文化的针砭推进到人木三分的地步。如果说阿多尔诺的反体系思想和罗兰·巴特的逆结构思想程度不等地总结了 20 世纪初叶和中叶的文学艺术运动,那么德勒兹和德里达的文学思想则明显地走在了文学风潮的前头。千座高原的意象,地下根茎的思绪,文学游牧的飘逸,以歧放生的延异,播撒式偶缘的推演,挣脱声音控制的尝试,这些超常规破惯例的思想为文学艺术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锐利的武器。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走出了政治化、民族化的局限,拓展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学世界。文学与政治相疏离,不仅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束缚,而且使文学真正地按其本然演化,从终极追求上折射政治的善恶,化解政治的强制性霸权;文学从民族主义视野的解放,意识到了他者的不可或缺,对文学自身乃至全人类的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文学从中心主义的突围,是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本性努力,也是西方人寻求另一种活法的最大胆的尝试。西方文学迈出的上述三大步,标志着西方文化中良性因素在空前地增长,西方人终于懂得了自我批判,懂得了他者存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西方的文学世界预示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文学。

第三,人本主义文学的变位。如果从远古说起,广义的西方文学

大致经历了由神文到人文的变迁。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之末是神文时代,这一时期文是神的附属,神是文的本质,敬畏神祇和磨合命运是古希腊以及中世纪文人骚客的基本格调。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叶是人的时代,这一时期泛指的人或大写的人经历了由人到我的演变,人文不仅战胜了神文,而且将人文的优缺点都发挥到了极致。

文学史编纂学总要把人文框架当作文学史的原点,这实际上只攫取了文学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多面特点和深层意蕴仍处于遮蔽之中。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古阶段,神文是底色,是前奏,是人文伸展不到处的终极推断。人们可以因为宣扬异教和蛊惑人心的罪名处死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可以在集时代精华的思想宏构中为神灵留下不可企及的尊位,可以在悲剧和喜剧的奇思妙想中把神谕和命运置于统驭剧情的关键,可以在天堂地狱的铺陈直叙中将人神交感的思想和盘托出。当此之时,人文精神在神文的土壤中酝酿,人性善果在宗教的氛围中涵养。

文艺复兴拉开了人文升值的序幕。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塑造出了大写的人,这种造人运动甚至阴错阳差地在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中延续。当左拉坚信新世界的萌芽之时,当巴尔扎克胸中还有两个太阳之时,当雨果笔下的英雄人物仍然套着救世的光环之时,当东欧乃至东方国度仍然笃信理想的大同世界之时,那个举步惟艰的大写的人还在踽踽独行。但是当20世纪西方世界相继完成现代性社会的转型之时,这个大写之人逐渐为个体之人或曰小写之人所取代。写小写之人蔚然成风,甚至东方国家的文学家也受到了影响。小写的人是英雄崇拜崩溃的产物,也是个性解放乃至个性消亡的人文过程。刻画小人物的作家不乏大手笔,他们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其中既有普鲁斯特、尤奈斯库、鲁迅、巴赫金等人积极用世的努力,也有卡夫卡、川端康成、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直面人生的无奈。

正如神文文学的登峰造极必然为自己的衰落准备了条件一样,人文文学的辉煌本身也为潜力的枯竭亮出了内囊。化解人文戾气的

文学在 20 世纪末叶形成了气候。这一次文学巨变虽然也有文学家们起风于青萍之末,但是作为一种划时代的重大的文化转向,主要是由亦文亦哲的思想家所推动。因此,人们不必仅仅聚焦于贝克特、弥勒、昆德拉、甘斯布等作家对现实的调侃,也不必局限于黑色幽默派或新小说作家们对社会合理性的逆证,而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整个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趋向。巴特晚期的解构主义小品,德勒兹中期的情节化哲理散文,福柯毕生的声情并茂的文史论述,阿多尔诺如泣如诉的美学理论,海德格尔亦诗亦哲的语思,凡此种种,无不置于可圈可点待解待建的状态。

在 20 世纪文学高手和思想巨匠的笔下,令人震撼的不止是“上帝死了”的逼真,而且有人的隐匿。主体风化,个体失灵,人文露底,现实无根,于是有了“无特性的人”,有了遥遥无期的“戈多”,有了文明吊诡的反弹,有了人文逊位的自觉。在这次新的天人互动中,天地秀出而人文谦隐,文原于道而功臻于化。人类懂得了隐秀和启蔽,懂得了牺牲和留白,懂得了非人文和亚人文的价值。

二

中国传统文学,是文化机制中最有生气的一个方面。封建主义对社会的禁锢,在文学上尤为突出。新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文学首当其冲。19 至 20 世纪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最严重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乃至文化变革最剧烈的时代——四千年的君主专制土崩瓦解,一百多年的列强欺凌接近尾声。广义的文学在这场大变革中扮演了启蒙的重要角色。

过去的一百年,中华民族从艰难竭蹶之中崛起。民族文学在民族命运的危亡之中仓促就位。特殊的历史背景逼出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色调,即以变革为要略的激进主义文学潮流。其基本特征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革命话语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救亡急切的文化左倾风潮;工具理性沉重的文学功能取向。从遵命文学到文学服

务论,激进主义文学占据着主流定位。救亡取代了启蒙,革命席卷了文学。革命文化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之同时文学的多元互动特点也受到了相当的局限。其长处在于程度不等地推进了救亡运动,弱点是把左倾天然合理的政治信念植根于几代人的意识之中。单向度的价值取舍影响了20世纪百年的文学流程,极左思潮在20世纪60至1970年代达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以至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文学不文的局面。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然而许多天才文人都未能发挥到最佳状态。以新文化为旨归的文学大纛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旷世人物可谓“时代风云卷战旗”;巴金、茅盾、沈从文等文学大师则属于“千古文章未尽才”;而王实味、老舍、冯雪峰等一代英华却成为革命祭坛的牺牲品,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痛心的记忆。

在中西各种文化大潮的冲撞激荡之际,中华民族并非全无折中权变之人。学衡思潮就是与激进主义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流派。就广义的文学研究、创作、鉴赏、管理、组织、传播等活动而言,此处的学衡是指学术思想兼容和文学活动的海纳百川。该思潮远远超出了以《学衡》杂志为主的学衡派。它实际上涵括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黄侃以及王国维、吴宓、陈寅恪、钱锺书等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著名的文学工作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这些人的总体趋势是主张改良、渐变、折中、融通。但是在中国20世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此种不乏深谋远虑的思想很难见容于当时的社会。其中有不少人被主流话语视作新文化运动的逆流、封建遗老、谬种妖孽或保守主义。这些人被排斥甚至受迫害之际,往往是中国文化气脉畸形演化之时。这些人得到公允评价之日,一定是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思想走出怪圈之后。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单色调现象不仅在于文学政治化的片面取向,而且也表现为对自身深远传统的单挑独取。文学大师和学术精英除少数人外,大都陶醉于刚从西方学来的文学思想,执着地“推陈出新”,大刀阔斧地“创造新文化的实绩”。实绩是很突出,其作用也

不可低估。但是就文学领域而言,所谓“创新”实际上是根据西方近现代文学原理,对中国文学“原料”的“提炼”或“改造”。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不仅仅是“原料”,而且也有其“原理”,甚至有着比西方近现代文学原理远为深沉的文学渊源。我们利用西方的刀尺,剪出了可与西方文学媲美的文学材料,诸如情志说、美刺论、雅俗观等文学成分,但是忽略了传统文学的一些更为本原的东西。强化了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反映功能,遮蔽了其作为炎黄子孙精神气质的独特脉络;完善了文学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细密的“西化”学科系统,丢掉了文通经史子集的融贯性优势……这些个在当时被人们弃之不顾或盼其速朽的文学传统,今天却又焕发出古老的睿智和年轻的朝气。尤其是当我们释读西方后现代思想的谜底之时,上述那些原本已被遗忘的华夏文学传统,不期然披露出生生不已的根本性智慧。老树正在绽放新芽。历史的波折就是这样诡密,在大起大落处迫使人们矫枉过正,但是过正之后又不得不补偏救弊。

20 世纪前半叶,左右中国文坛的思想理论是文艺社会政治学,在文艺实践方面领袖风骚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毋庸置疑,它们对中国文学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思潮在西方和在中国都属于以偏概全的文学流派。在西方它们是 18、19 世纪工业化社会形成期的单向度文化现象,不仅违背了古希腊文艺传统中的遗风,而且窒息了對抗资本主义机制化的异质性文艺生机。在中国它们适应了“万众一心”的民族解放潮流,但是遮蔽了“文”在万象、“艺”在百花的本色,阻滞了对其他新思潮的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单向度文艺状况在 19 世纪末叶和 20 世纪上半叶就有所变化,象征派、野性派、超现实派、存在主义派、荒诞派、新小说派等文艺思潮波涌浪接,与 20 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主义前后呼应,形成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新景观。我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固定了文艺社会学体制的同一性格局,一直到 20 世纪末叶才出现了重审祖国的文学遗产和较大幅度引进西方文化思潮的开放性局面。西方人走出单向度的文艺规范用了 100 多年的时间,古风

的回潮与后现代主义的勃兴并非偶合。我国引进、吸收和化解西方19、20世纪文艺思潮的过程也有将近100年的经历。

不难看出,西方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欧美文艺史上的一次划时代变革:剔除了两千年来文艺理论观念的折叠式递换形式,开辟了多元对话甚至破绽式对话的全新氛围。折叠式递换是指中世纪神学文艺观——文艺复兴思想——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的递相取代。多元对话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检讨式的开放。破绽式对话是指意识形态文学、民族国家文学的自动消解和人本主义文学的谦以通变,代之而起的是全方位开放的对话理论,后现代思潮就是该理论的集中体现。解释学的循环、解构主义的播撒、东西欧狂欢节思想的交响……这些个横向的超国别对话实际上也是思接千载的跨时空交谈。然而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并未能与这样一次非常重要的反霸权文化思潮摆开真正的龙门阵。有一些跃跃欲试的“后现代对话”实际上还是在做自说自话的“独白”。理论界面对逸出辩证法法力的新思潮往往手足无措。

检讨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路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文学视野的狭窄。在文学的文化价值判断上,主流话语将一种观点当作进步,以己划线成了司空见惯的推理模式;要么革命派,要么反动派;在文学的文化时空思想上,人们不能接受史无新旧、学无古今的通变观,不能接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现实都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跨时空视域;在文学的终极学术追求上,人们无法理解本根在界、本真无界的达观,在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时忽略了今为古用、中为洋用的互动层面;在文学的直接交流上,人们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拿来主义,偏执于定向定势定位的意识形态取向,圆观宏照的视域和化感通变的工夫始终有待拓展;在文学创、传、读、评的阐释循环上,人们更多地是重中心而轻边缘,重当下而轻长远,重焦点而轻散点,重人文而轻自然,重自己而轻他人,重有为而轻无为,将文学创演的复杂活动局促于越来越小的单一向度。毋庸置疑,时代呼唤开放的文学,开放的文学是对古往今来开放,对天地人神开放,对有限无限

开放,对学术门类开放。

20 世纪初叶和中叶,中国文学作了革命的马前卒,承担了文化救亡的历史使命,20 世纪末叶则和国家的改革政策一起进入了开放的时代。可以说中国的 20 世纪文学在一百年的急行军中,完成了始以救亡带启蒙,继而由改革促现代化的急就章。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潮流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之中,“新时期”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断代命名。尽管文学史的分期依据不无歧见,但是,多数人都愿意承认,一种意义重大的巨变,出现于 1978 年前后。这时开始,文学汇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人们置身于“新时期文学”之中,亲历种种大大小小的文学事件,参与激烈的争辩,投入地阅读一系列成熟或者不成熟的作品。“新时期文学”业已持续了 20 余年,一大批纷然杂陈的文学景观正在祈求文学史的评估和定位,赋予其历史意义。

文学史是一种历史性的清理。人们将退出参与者的角色,换取一个历史观察者的立场。时间的间距为人们的观察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背景,一系列的衡量与定位拥有了更多的参照坐标。事实上,这样的文学史意味着,人们试图选择哪些文学个案——哪些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事件——充任文学知识的范例,维持文学学科的框架与规模,并且解释这个历史时期文学话语的功能。

一个无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是:1980 年代、1990 年代的中国文学是否从属于某个宏大主题?这个宏大主题是文学史的中轴线。当然,并非任何时期的文学都将指向某一个共同的归宿。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出现,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文学肯定会作出必要的呼应。这时,文学不仅作为某种文化成份参与历史语境的建构,另一方面,